

【鲁迅研究】

“竹内鲁迅”的周边

董炳月

【作者简介】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中日文学关系、新疆现代文史研究（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杭州），2023.6.32～38

“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 1944 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 1980 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1](P.339)}最近二十余年，域外的鲁迅研究成果中对中国本土的鲁迅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这个“竹内鲁迅”。《鲁迅》已有两种中文译本，竹内的鲁迅论与其“近代论”“亚洲论”一起被众多研究者讨论，“回心”“超克”成为时髦用语，“作为方法的xx”也成了模式化的命题方式。在中国知识界，竹内译介、竹内研究拓宽了东亚研究、现代思想研究、鲁迅研究的思路与视野，但另一方面，对于竹内话语，也出现了过高评价、过度阐释、过度消费的“三过”现象。所幸，近年已有研究者开始“正本清源”，客观评价竹内好。比如，2016 年，孙江在其论文《在亚洲超越“近代”——一个批评性的回顾》中尖锐地指出：“在日本中国学界，除去鲁迅著作的译者和研究者身份外，竹内好称不上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地位；即使作为评论家，竹内好也算不上出色，因为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对中国的判断都悖离实际。”^{[2](P.166)}“竹内好所谈论的亚洲，无论是作为理念的，还是作为方法的，都与亚洲无关，而他所张扬的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建立在‘他者’不在的基础上的。”^{[2](P.171)}“当竹内好研究热兴起时，正是历史修正主

义和反历史修正主义围绕战争认识博弈正炽之时，竹内好这种模棱两可的战争认识和责任认识成为‘沉默的大众’——知识分子的避风港。”^{[2](P.171)}微信公众号“谓无名”2023 年 9 月 20 日推送了这篇论文，“编者按”明言：“孙江教授力图通过对亚洲主义实像的历史把握，驱散竹内好的幽灵。”^①在对“竹内鲁迅”的接受方面，类似的误读或“错位”同样存在。有研究者模仿“竹内鲁迅”(以及“丸山鲁迅”)这一概念，用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的名字命名其鲁迅论，提出了数种“某某鲁迅”。殊不知“竹内鲁迅”是突显竹内鲁迅论影响力的概念，也是将鲁迅相对化，同时将竹内好的鲁迅论相对化的概念。在我看来，所谓“某某鲁迅”，只有在鲁迅研究史或方法论的层面上才能成立，即某位研究者在鲁迅研究的某个阶段，或者运用某种方法，提出了对于鲁迅的独特认识。在主体的意义上，“某某鲁迅”不成立，不存在。鲁迅者，鲁迅也。鲁迅就在那里。无论是多么杰出的研究者，都只能走近鲁迅、理解鲁迅、发现鲁迅，而不可能与鲁迅相加，成为“某某鲁迅”。

—

那么，“竹内鲁迅”是怎样诞生的呢？换言之，竹内好为何、怎样撰写了《鲁迅》？最近，陈朝辉发表了论文《论“竹内鲁迅”的生成》，专门探讨该问题。陈朝辉在文中说：“早年竹内对鲁迅几乎无感。甚至以‘无视’一词来形容都不为过。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鲁迅如此无感的竹内却在 1944 年 10 月被征召入伍

之前,突然以写遗书的心态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本专著《鲁迅》并一举成名。这不得不使人对其生成的过程及其质变的契机,抱有好奇心。”^{[3](P.109)}陈朝辉所谓“早年竹内”指1932—1943年间的竹内好。这确实是个有意味的发现。十多年间“对鲁迅几乎无感”的竹内好怎么忽然撰写了《鲁迅》?这确实是个问题。陈朝辉从竹内好面对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的纠葛切入,对此进行解释,结论是:“竹内的文学观是在日本文坛深陷政治与文学相纠缠的泥潭中难以自拔的大历史环境中生成的。‘竹内鲁迅’的生成过程也不例外,它貌似突兀,实则不然,其背后有竹内对政治与文学关系常年思考的结果在做支撑。”^{[3](P.114)}这种解释充满善意,有历史依据,有启发性,但忽视了《鲁迅》背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历史脉络。竹内好何以写《鲁迅》?丸山升的解释更为简洁。丸山升早就指出:“竹内好的《鲁迅》一书的写作动机之一,便是对小田的《鲁迅传》的批判。”^{[1](P.338)}确实如此。竹内好撰写《鲁迅》的直接动因是小田岳夫《鲁迅传》的刺激。如果小田岳夫不写《鲁迅传》,竹内好未必会在那个时间点上写《鲁迅》,“竹内鲁迅”也未必是现在这种形态。

小田岳夫(1900—1979)年长竹内好十岁,1922年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入外务省亚洲局任职,1924—1928年被派驻杭州日本领事馆。因为热爱文学,他1930年从外务省辞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1936年即以短篇小说《城外》获芥川文学奖。1940年下半年,他撰写了《鲁迅传》。《鲁迅传》出版于昭和十六年(1941)三月,由序章和“清朝时代”“辛亥革命之后”“国民革命之后”三大部分(共十二章)以及附录“鲁迅著作年表”构成。小田在该书《后记》(所署写作时间为“昭和十六年早春”)中交代了写作缘起、写作方针等等。他说自己撰写《鲁迅传》有些偶然,本来是希望鲁迅的学生增田涉撰写,而增田无暇动笔,他只好自己动手。因鲁迅的生平资料匮乏,传记写作主要是依赖鲁迅作品,写作过程中曾受到中野重治《鲁迅传》的启发。写作方针则是“基于‘传

记’的性质,尽力避免主观性的解释或评判,始终保持淡泊、从容的态度”。关于书中的鲁迅,他说:“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将笔墨向鲁迅的‘爱国者’层面集中。不过,另一方面,如果看到鲁迅一生心中都最为炽烈地燃烧着‘爱国’之火,那么出现那种叙事倾向也许是理所当然的。鲁迅在青年时期之后,好像几乎终生都对执政者、当权者怀着憎恶与反感,我想,读者读了这本传记,容易理解那是植根于其真正的‘爱国’之情。”^{[4](P.315)}在1940年至1941年这个时间点上突显鲁迅的“爱国”,可以做多种解释。^②

小田岳夫使用资料(鲁迅作品)的方式,《鲁迅传》呈现的“爱国者”鲁迅,都被竹内好否定。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竹内好撰写《风花雪月》一文,谈日本的鲁迅研究和鲁迅传记写作,批判了小田《鲁迅传》。他尽管表扬《鲁迅传》“是最早研究鲁迅的单行本,是一本很好的书”,“作者认真细致地整理了鲁迅的文章,并重新调整了结构”,但从根本上否定了该书,说“我不认为书中所写的就是鲁迅其人”,“我只能说整体上都不对。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不满之处,那就是作者过于朴素、过于轻信原作,对原作只做表面功夫,而没有从其深理解。作者过于依赖这个或称之为文章、或称之为表达的二元世界,错把这一假象当作了现实。进一步说,就是混淆了文章的真实与事实”。^{[5](P.281)}这种否定是根本性的,而且,这否定之中已经包含着竹内好本人对鲁迅作品的基本认识——鲁迅的文章呈现的有可能是“假象”,背离事实的“假象”。无疑,这是竹内好早就持有的鲁迅观。

意识到竹内好对小田《鲁迅传》的批判、将竹内《鲁迅》作为小田《鲁迅传》的“批判之书”来阅读,会看到二者之间的对立。《鲁迅》第一章为《关于传记的疑问》,这可以并且应当理解为竹内好是眼前晃动着小田《鲁迅传》对“传记”提出“疑问”的。与小田《鲁迅传》呈现的爱国者、政治性鲁迅不同,竹内好在《鲁迅》中建构、强调鲁迅的“文学者”(文学家)身份——

所谓“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6]（《关于传记的疑问》，P.39）。这种建构和强调明确针对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鲁迅。竹内好说：“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拔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6]（《思想的形成》，PP.57-58）而且，竹内好将这一问题上升到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高度，将二者分离开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相衬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所谓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6]（《政治与文学》，P.134），等等。在将鲁迅界定为“文学者”的前提下，他用“无”“回心”“赎罪”之类的概念解释鲁迅文学的起源与鲁迅文学。在把握鲁迅作品的方式上，与小田岳夫的“过于轻信原作”不同，竹内好怀疑鲁迅的文章，努力穿过鲁迅文字的表象，发现文字背后、文字之外的另一种“真实”。其最为大胆的怀疑，是针对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中讲述的“弃医从文”故事。他说：“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拿这件事和我所称之为他的回心的东西相比较，并以此作为一条途径来探讨他所获得的文学自觉的性质，将是一种便捷的方法。”^[6]（《思想的形成》，P.53）这里，竹内好在否定鲁迅自述的同时，提出了对于鲁迅文学起源的独特解释，即所谓“回心”。这种否定本质上是对鲁迅文学起源政治性（用文学唤醒国民）的否定，也是对“爱国者”鲁迅的否定。同样是为了否定鲁迅的政治性，竹内好还质疑人们对鲁迅参加杨杏佛葬礼不带钥匙故事的讲述，说：“据说在死的前三年，他去参加杨杏佛葬礼时出门竟不带钥匙。我觉得这话有些靠不住。说靠不住，不是说事实有误的意思，而是我

觉得对于这一事实的解释过于政治化了，把他打扮成了英雄。”^[6]（《关于死与生》，P.9）

从与小田《鲁迅传》多方面的对应、对立关系来看，竹内《鲁迅》的撰写与“竹内鲁迅”的诞生，都是“反小田《鲁迅传》”的结果。当然，这种“反”的前提是竹内好本来就有自己的鲁迅观与鲁迅作品解读方法。对于小田《鲁迅传》的“否定”将竹内好推向了与《鲁迅传》相对的另一极——在对鲁迅本质的认识方面，在对鲁迅文章的解读方法方面，都是如此。这种影响可以称为“逆向影响”。当然，小田《鲁迅传》与竹内《鲁迅》的关系不限于此，比较复杂，有待于进一步探讨。1985年6月，小田岳夫去世七周年之际，《小田岳夫著作目录》^[7]出版，其中收录了日本鲁迅研究名家伊藤虎丸（1927-2003）的文章《小田岳夫先生与中国文学》。伊藤在文中对自己在战后阅读小田《鲁迅传》时过多受到竹内好批判《鲁迅传》的影响有所反省——所谓“只想到竹内《鲁迅》是以对于小田《鲁迅传》的批判为主题”，并指出“毋宁说，是在小田先生《鲁迅传》的基础上（即在基本肯定小田先生呈现的鲁迅像的前提之下）才有竹内先生的《鲁迅》出现”，“将两本书并读，会认识到竹内从小田那里继承的东西有很多——例如将鲁迅与孙文并论这种视角。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相反，对于《鲁迅》的结构与问题意识，都不能充分理解”。^[7]（P.23）

竹内《鲁迅》与小田《鲁迅传》之间存在着对话关系，因此阅读《鲁迅传》是深入理解“竹内鲁迅”的前提之一。确如伊藤虎丸所说。

二

竹内《鲁迅》是小田《鲁迅传》催生的，诞生之后又和《鲁迅传》一起对其后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传记写作发生影响。最早同时接受二者影响的，是著名作家太宰治（1909-1948）的传记小说《惜别》。

1944年初，太宰治接受“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决定以鲁迅留学仙台医专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传记小说，以贯彻所谓“大东亚共荣五项原则”，表现所

谓“大东亚亲和”。太宰治当年年底前往仙台搜集资料,进行实地考察,1945年年初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写出了《惜别》。不过,《惜别》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却拖到日本战败20天之后的1945年9月5日。相关问题,我在论文《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惜别〉研究》[8]中做了详细论述。关于《惜别》与小田《鲁迅传》、竹内《鲁迅》的关系,太宰治在《〈惜别〉后记》中做了说明:“搜集材料时,我的前辈、小说家小田岳夫先生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于小田先生与支那文学的关系,无人不知。没有小田先生的赞成和帮助,笨拙的我不会下定决心从事这种很费气力的小说的创作的。小田先生已经创作了《鲁迅传》这一春花一样甘美的名著,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恰在那之前,完全出乎我预料地,竹内好先生把他刚刚出版的、像秋霜一样冷峻的名著《鲁迅》惠寄给了我。我与竹内先生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9](P.128)}《鲁迅》出版时竹内好已经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鲁迅》是竹内好委托出版社寄赠给太宰治的。这个事实意味深长。与太宰治未曾谋面的竹内好为何希望太宰治阅读《鲁迅》? 如果他知道太宰治正准备写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小说,那么他就是希望自己的《鲁迅》影响太宰治的创作。“五项原则”的作品化是1943年前后日本文学界的一件大事,1943年底至1944年初“日本文学报国会”机关刊物《文学报国》多有报道、讨论。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影响力和竹内好当时的处境来看,竹内应当知道太宰治的创作任务。这个问题有待考察,不知日本学者有无研究。但无论如何,创作《惜别》之前,小田《鲁迅传》和竹内《鲁迅》确实同时摆在了太宰治面前。太宰治看到了二者的巨大差异——前者“春花一样甘美”而后者“秋霜一样冷峻”。从《惜别》的内容来看,太宰治对鲁迅的理解、把握鲁迅作品的方式接近小田岳夫。《惜别》中的鲁迅是满怀政治热情的爱国者,声称“我的爱国之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人。正因为喜爱,所以不满也很强烈”^{[9](P.30)}。这种鲁迅,太宰治是通过将鲁

迅的文章改写为《惜别》主人公的自白呈现出来的,即太宰治也和小田岳夫一样相信鲁迅的文章。《惜别》呈现的鲁迅与“竹内鲁迅”相去甚远,自然会受到竹内好的批判。竹内好在写于1956年的文章《风花雪月》中批判了小田《鲁迅传》,同时更为严厉地批判了太宰《惜别》。竹内好说:“其实,风花雪月更符合日本人的心性,所以连看似反对风花雪月的太宰治的《惜别》,都让我有风月之感。但是这部作品所写的恐怕是无视鲁迅文章、主观臆造的形象——确切地说是作者的自画像。……战时我比较喜欢太宰治,但是复员归乡后读《惜别》却令我很失望。我觉得他太天真了,而我期待的恰恰是与他的天真相反的东西。最近关于太宰治的评论很多,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把《惜别》作为课题来研究呢? 其实,一个人的致命伤不正是这个人本质的显现吗?”^{[5](P.282)}等等。这批判之中应当包含着竹内好对于太宰治漠视《鲁迅》的失望与愤怒。此时,太宰治已经自杀身亡八年,无法反驳竹内好,而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日本的鲁迅研究名家藤井省三驳斥了竹内好对《惜别》的批判。2005年底,在《惜别》中译本即将出版时,藤井省三为中译本撰写了序言《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在序言中肯定《惜别》呈现的鲁迅,否定竹内对《惜别》的批判,说:“如果太宰在九泉之下读到竹内‘仅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捏造的鲁迅形象——与其这样认为不如说是作者的自画像’这一批评,也许会原封不动地将这一批评全部交还给竹内吧。”^{[9](《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 P.4)}所谓“将这一批评全部交还给竹内”,是说竹内好《鲁迅》呈现的鲁迅形象才是著者竹内好的自画像。

三

小田《鲁迅传》、竹内《鲁迅》与太宰《惜别》,三者结构性地呈现了战前日本知识界的鲁迅认识,可称为“战前日本鲁迅三部曲”。

如丸山升所说,《鲁迅》代表的“竹内鲁迅”“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的具体情形须结合特定鲁迅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来认识,但

整体上,对于“竹内鲁迅”的深化、超越或颠覆是基本趋势。“颠覆”更意味深长。“颠覆”也是一种接受影响的方式,如同竹内《鲁迅》因批判小田《鲁迅传》而走向另一极。在战后日本彻底颠覆“竹内鲁迅”的,正是强调“竹内鲁迅”影响力的丸山升。丸山升1965年出版了《鲁迅——其文学与革命》(平凡社),1972年出版了《鲁迅与革命文学》(纪伊国屋书店),他阐释的鲁迅自成体系、影响广泛,被称作“丸山鲁迅”。“丸山鲁迅”本质上是“革命人鲁迅”。“革命人鲁迅”的提出是针对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对此,丸山升本人有明确表述:“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1](P.30)}可见,在丸山升这里,对于竹内好来说具有本源意义的“文学者鲁迅”不过是“革命人鲁迅”的衍生物。关于丸山升的“革命人鲁迅”,近年靳丛林、赵京华、高华鑫等学者均有详论。靳丛林与李明晖等学者合著的《日本鲁迅研究史论》^[10]用两章讨论“丸山鲁迅”,赵京华新著《活在日本的鲁迅》^[11]第二章《“政治与文学”关系阐释架构中的鲁迅》中的一节为《丸山升:“革命人一元论”鲁迅观》,高华鑫发表了论文《“革命”的多义性——思想史中的“丸山鲁迅”》^[12]。“革命人鲁迅”是丸山升对鲁迅的基本认识,强调的是鲁迅的政治属性,本质上不同于“竹内鲁迅”,而与小田岳夫的鲁迅观相通。丸山升的研究方法,也是与竹内《鲁迅》的观念论、原理论、怀疑论相对的实证方法。就是说,在基本观念、研究方法两个层面,“丸山鲁迅”都不同于“竹内鲁迅”。不仅如此,丸山升对于竹内好中国论的主观性、先验性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论文《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从“左联”研究、鲁迅研究的角度谈起》中说:“至于竹内好,在他的中国论中作为有意识的‘方法’选取的视角,与其说是通过和中国的

对比来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不如说是先存在着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其结果便导致一种倾向:当竹内好的日本批判敏锐地击中要害时,被设定为另一极的中国所具有的特质就被尖锐地刻画出来;但另一方面,倘若竹内好的日本批判稍稍偏离要点,就那一问题描述的中国像和中国现实的偏离便十分明显。”^{[1](P.187)}丸山升是说:中国有时是竹内好“设定”之物,竹内好“设定”的中国有时明显偏离现实中国。

读《鲁迅》可知,“竹内鲁迅”是“文学者”(非政治)的鲁迅,“无”的鲁迅,“回心”的鲁迅,“赎罪”的鲁迅。这些“鲁迅”尽管有可能是鲁迅思想、精神、文学中的某个层面,但今天看来,作为鲁迅观有主观、混乱之嫌。受到资料、文本解读方式、基本观念、批判小田《鲁迅传》动机的制约,竹内《鲁迅》并不成熟,误读鲁迅之处颇多。竹内好对于鲁迅文学起源、文学自觉的解释有违史实,“回心”说似是而非、难以自洽,“赎罪”说是以偏概全。关于竹内好对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曲解,高远东早在2007年就做了具体分析,并尖锐指出:“竹内好的鲁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远离鲁迅的历史性存在为特征,以放弃对鲁迅的‘实体性’理解为代价的。”^{[13](P.22)}尤其是作为《鲁迅》主体结构对于鲁迅、政治、文学三者关系的解释,暧昧且多有自相矛盾之处。这是因为竹内好用自己的框架无法处理鲁迅鲜明的政治性。对于《鲁迅》的这种“政治与文学”论,丸山升用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文坛的状况来解释,说:“几乎所有的文学都被作为推进战争的手段,作为统一日本人民思想的手段受到动员;在文学家之中,出现一部分人对此积极响应,高唱正是为国家为战争的文学才是取代欧美近代文学的更为高度的文学的‘文学论’。同时,大部分的文学家在政治方面不必说,思想方面也没有抵抗力,随波逐流。”^{[1](《日本的鲁迅研究》,P.343)}基于此,他把竹内好对于鲁迅“文学者”身份的强调解释为“对上述的日本文学状况的殊死抵抗”^{[1](《日本的鲁迅研究》,P.343)}。前述陈朝辉的解释也是采取同样的思路。问题是,就政治态度而

言,竹内好在撰写《鲁迅》之前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太平洋战争”。^[6](《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P.345)因此,他即使在《鲁迅》中做出抵抗“政治”的姿态,这种姿态也是虚伪的、无效的。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大概还是在于与小田《鲁迅传》呈现的政治性鲁迅的对立。相关问题,藤井省三的批评一针见血:“竹内是用政治与文学的对立这一图式展开其鲁迅论。对于生活在战争状态下的竹内来说,‘政治与文学’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但是,鲁迅所生活的1910至1930年代的中国政治与文学状况,与竹内所直面的战时日本的情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竹内好的言论作为鲁迅论是毫无价值的观念论。”^[9](《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P.4)按照丸山升的说法,竹内好本人“后来也反复指出‘政治与文学’这种立论方法的无效”^[11](《日本的鲁迅研究》,P.345)。这意味着竹内好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鲁迅》代表的“竹内鲁迅”。

竹内好在《鲁迅》第一章《关于传记的疑问》中就说《鲁迅》是“不成熟的研究笔记”^[6](P.16),这并非自谦。那么,问题多多的“竹内鲁迅”何以能够对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影响?原因显然并不在其科学性 with 系统性,而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鲁迅》论述的鲁迅之死、鲁迅生存状态、鲁迅思想的本质、鲁迅文学的起源、鲁迅作品的价值、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启蒙等等,都是鲁迅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无论是否认同竹内好的观点,都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沿着同样的思路前行;二是竹内好带着强大的主体性评判鲁迅、与鲁迅对话,用“无”“回心”“赎罪”等深奥的概念将鲁迅陌生化,用近于故弄玄虚的修辞技巧制造了一个“鲁迅迷宫”,这些概念、这个“鲁迅迷宫”能够充分调动研究者的思维,开辟新的思维空间。不过,“竹内鲁迅”在战后日本实际上具有多大影响,是可疑的。丸山升“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表述大概包含着谦逊、向前辈学者致敬的成分。从“丸山鲁迅”对“竹内鲁迅”的超越、伊藤虎丸的反省、藤井省三的批判来看,所谓“竹内鲁迅”的影响力也许早就成为“传说”。

要言之,竹内好《鲁迅》的撰写有特定的环境与背景,“竹内鲁迅”诞生、存在于日本鲁迅论的漫长历史脉络之中。“竹内鲁迅”只有回到其历史坐标上,才能突显其价值。这是阅读《鲁迅》、理解“竹内鲁迅”时应当注意的。

注释:

①见微信公众号“谓无名”(grandviewea),2023年9月20日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De6BUPR7H10Wx7g9v_B6-Q。

②相关问题可参阅徐利“爱国者”的背面论小田岳夫〈鲁迅传〉中的鲁迅形象及其塑造逻辑》,《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孙江:《在亚洲超越“近代”?——一个批评性的回顾》,《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3]陈朝辉:《论“竹内鲁迅”的生成》,《日语学习与研究》,2023年第4期。

[4]小田岳夫:《鲁迅传》,东京:筑摩书房,1941年。

[5]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6]竹内好:《鲁迅》,孙歌编:《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7]小田三田编:《小田岳夫著作目录》,东京:青英社,1985年。

[8]董炳月:《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惜别〉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9]太宰治:《惜别》,于小植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0]靳丛林、李明晖等著:《日本鲁迅研究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11]赵京华:《活在日本的鲁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12]高华鑫:《“革命”的多义性——思想史中的“丸山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13]高远东:《“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4期。